

再说“医圣”张仲景

水兵

南阳“四圣”是南阳古代圣人先贤中四朵奇异的花,无论在国内或是国外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。其中范蠡、张衡、张仲景是南阳本土圣人无可争议,范蠡是商业典范,张衡是科学巨匠,张仲景是医学大家,唯有“智圣”诸葛亮“躬耕地”问题有些不同说法,但大量史料记载和地理书籍考证都足以证明,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。

其他“三圣”都有传记和大量历史记载,唯有“医圣”张仲景“阙如”,何也?

他官至州府,做过长沙太守,凭借其流传后世的《伤寒杂病论》等医学典籍,在民间广为流传,留名中医祖庭,冠以“医圣”之名,得以名垂青史。然而,如此光耀历史之人物,却未见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等正史记载,只在民间传说或后人野史笔记中有所提及。而与之同时代的名医华佗、董丰却在《三国志·方技传》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中留有大段记载。董丰的“杏林春暖”,使“杏林”也逐渐成为中医药行业的代名词。

堂堂东汉三大名医,其中二人都有史书记载,唯有官至太守的仲景先生没有,何也?张仲景到底存不存在?倘若存在,又为何不见于正史呢?

著名散文大家周同宾先生学富五车,博览群书,他生前曾专程到长沙走访,也只见到后人为张仲景敬立的“长沙太守张仲景碑”,只在后人编纂的《长沙市志》中看到记载:“建安十三年,是年长沙瘟疫流行,太守张仲景医术,坐公堂为庶民义诊,活人甚众。”民间传说则是流传大街小巷,随便问一个成年人,都如数家珍,仿佛张仲景就是家人,就在眼前,是敬重的亲人也是崇拜的圣人,周同宾先生为此大为困惑。

据《长沙市志》记载,张仲景在建安十三年(208年)时,仍为长沙太守。这一年,恰好是曹刘争夺荆州之际。曹操败北后,刘备略定江南四郡,长沙郡也划归刘备集团掌控。蜀汉221年建国,263年灭亡。仲景219年病逝,应是在刘备集团管辖中,那样,即便张仲景能见于史书,也应该在“三国志”的《蜀书》中,而不会在《魏书》中。然而,关于蜀国官员的史料,却极度匮乏。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记载:“国不置史,注记无官,是以行事多遗,灾异靡书。诸葛亮虽达于为政,凡此之类,犹有未周焉。”如此一来,蜀国朝廷官员的史料,难免会“缺斤少两”。像张仲景这样的地方官员,晚年又辞官隐居乡间,专心著述,不被蜀汉、曹魏两国史家记载,也就正常了。

一个人未见于史书记载,并不代表他不存在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中未写屈原,难道屈原便不存在了吗?屈原之文,仲景之医,哪怕不见于史书,仍有后人铭记于心。话虽如此,华佗入史书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为何华佗入得,张仲景便入不得?据《三国志·华佗传》记载:“然(华佗)本作士人,以医见业,意常自悔。”作为功成名就的神医,华佗为何会经常感到后悔?盖因当时社会对医者颇有偏见,以至于医者地位普遍不高,远不如士族。华佗被陈寿编入“方技”,与看相、算卦、解梦的“神人”并列,便可见一斑。

华佗虽然名声在外,却依旧向往仕途之路。他从一开始给县吏、府吏等地方小官看病,逐渐变为督邮、将军乃至郡守、太守这样的地方大员,最后得以通天,以一介白丁村医的身份接触到了魏主曹操。可惜伴“君”如伴虎,曹操头痛,华佗要

他“开颅”以救治。那个时代科技不发达,远没有达到华佗的经验,华佗因“操作不当”,触怒疑心很重的曹操,最终下狱而死。正如曹操所言:“小人养吾病,欲以自重。”华佗意在挟医求官,殊不知,这恰好撞在了曹操的“枪口”上。可见,华佗之死的背后,一是曹操的多疑,也有几分政治原因。不仅如此,华佗常年游走于宦宦之家,名声鼎盛,被载于史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反观张仲景,主要活动范围尚在长沙及荆州南部一带,游走在百姓大众之中,最后隐居著述,结交的汉末名人,不过王粲、何颙二人而已,没有身在朝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未能显名于世。陈寿作史,本就惜字如金,张仲景在政治上仅是一个乱世的太守,况“大堂行医”的行为,也被当时士大夫所不齿,甚至讥讽嘲弄,不被载入正史倒完全可以理解。

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未载仲景事迹,但他的医学成就却常见于魏晋隋唐时期的典籍中。最早提及张仲景的,当是西晋太医令王叔和。王氏在编著其中的《伤寒论》前言中明确指出:该书为“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述”。仲景活跃在建安年间,王叔和亦出生于建安十五年(210年),两人相距不过数十年,可见叔和之语应当颇为可信。同时代另一位医学名家皇甫谧,也对张仲景推崇备至。他在《针灸甲乙经序》中说:“汉有华佗、张仲景,华佗奇方异治,施世者多,仲景论广伊尹《汤液》为十数卷,用之多验。”加之皇甫谧为史家出身,本就掌握不少典籍,所知仲景人与事迹绝非捕风捉影。王叔和与皇甫谧所处的时代,距离汉末三国时代不过几十年,他们在著作中不约而同地提到张仲景,并将其视为不逊于华佗的一代名医。

可见,张仲景不是虚幻的,更不是传说的,而是一个实实在在为民众解除病痛顽疾的良医大德之人。

那么,这位出生于南阳的医道先贤,生平理想到底怎样呢?

张机,字仲景(150年-219年),东汉时期南阳人,曾做过长沙太守,因此也称“张长沙”。张仲景在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,进入官场。在建安年间,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。古人的处世哲学有一个以小见大的规律,如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,进而平天下。商朝名相伊尹曾言:治大国若烹小鲜。所以古人也把预防治疗身体的疾病与治理国家进行类比,于是古代的读书人都有这么一种情怀——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。比如张仲景,原本做地方父母官,但自小又非常喜欢行医救人,就曾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,积累了不少的临床经验。

张仲景所生活的东汉末年,不仅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,而且天灾瘟疫盛行,许多人要么是饿死,要么是病死,张仲景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生出一种使命感与悬壶济世的热忱。

建安初年后的10年,天下有三分之二人口被疫病所感染,其中伤寒类疾病占七成,《伤寒杂病论》序中,张仲景自序道:“余宗族素多,向余二百。建安纪年以来,犹未十稔,其死亡者,三分有二,伤寒十居其七。”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,处理公务闲暇时就为百姓看病。但在封建年代,碍于官场礼俗,政府官员是不能随便进出民宅接近百姓的。但不接触百姓,就不能为人们医病,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医术。于是张仲景就想了一个办法,决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,不理政事,大开衙门,让有病的百姓到大堂上来,他则端坐在堂上,为百姓诊治。



张仲景画像

后人因为崇敬张仲景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,便仿效他,把在中药店行医的中医称为“坐堂医生”,“坐堂医”也便由此而来。把中药店多称为“堂”,如同仁堂、同济堂等。

张仲景在坐堂行医的时候,接触了不同的患者,也见识了各种疑难杂症。在为病人医治的过程中,张仲景不但医术更为精湛,也结合以往的经验,总结了更为科学、系统的养生经验。比如“祛寒娇耳汤”就是寒冬“祛寒防冻”的经典养生汤,后演变为“饺子”“扁食”,成了今天的美食。

为把自己的医术和从医经验传于后世,仲景辞官隐居,历时五年,于公元210年,写成了流传千古的中医名著《伤寒杂病论》。《伤寒杂病论》序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上以疗君亲之疾,下以救贫贱之厄,中以保生长全,以养其身。”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医德。

何为圣?张仲景称不称得上“圣人”呢?

古人所推崇的圣人,标准还是很高的,“圣人”并非什么人当得,仅仅有拔尖的专业、卓越的贡献还不够,更要有一颗仁者厚德之心,厚德载物,心系苍生。

在东汉末年乱世,张仲景舍弃功名,历经万千磨难,写就《伤寒杂病论》《辨伤寒》十卷、《评病药方》一卷、《疗妇人方》二卷、《五藏论》一卷、《口齿论》等,被后人称为“活人书”,拯救无数百姓性命,甚至可以说拯救了中华医学文明。尤其是他的《伤寒杂病论》,是一部中华奇书。这部著作中体现出来的“辨证论治”的重要医学思想,可以说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理论主宰。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在医学上的贡献,使他在中医学史上享有殊荣。汉代以后,研讨《伤寒杂病论》的论著超过五百家,张仲景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,特别是在日本、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影响很大。中医院校的学生都以张仲景为楷模,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世的探索。

他被称为“医圣”,实至名归,万世敬仰!

药香泽后世,医圣播天下。今天,南阳要打造世界中医药高地和中医药产业发展典范,让我们的“国粹”中医药发扬光大,实是战略高远,是仲景“医者仁心”的弘扬和体现。③5